

## 河洛春秋——河洛姓氏源流

□记者 孙钦良

工、农、商、学、兵、艺、师、陶、医、药、铁都是姓，归入行业姓氏。

## 行业姓氏知多少

查《洛阳市志》人口志，可知我市有行业姓氏中的农、商、学、师、陶、药、铁姓，没有工、兵、艺、医姓。

农姓来源有三：第一出自神农氏，是炎帝的后裔。炎帝对农业有贡献，其后人中有的便以农为氏。第二是以官名为氏。远古时期，负责管理农事的官称为农正官，任此官职的人，其后代以官名中的“农”字为姓，称农氏。第三，北宋时期，广西壮族人侬智高建立“南天国”，率众攻占南宁一带，自称“仁惠皇帝”。北宋王朝遣大军围剿，侬智高战败，朝廷勒令其部族改为汉姓，于是一部分人改为赵姓，一部分人将侬字省去人旁，以农为姓。偃师寇店镇有农姓人家。

商姓比较常见，在当今中国姓氏中排第244位，有近40万人。早年我有一位朋友叫商伟帆，在洛阳地区地名办工作，后来去了北京。据他讲，成汤的后人皋辛隐居于商城之东，遂以商为姓。其实，商姓还有其他来源：一是出自子姓，乃商王族的后裔，以国名为氏。据《通志·氏族略》记载，“唐尧封帝喾之子契于此，传十四世至成汤，灭夏而有天下，以商为国号。后商被灭于周，子孙以国为氏”。二是黄帝的重孙被封于今陕西商县，其后代便以商为姓。

商姓历史名人很多。周代数学家商高写了中国第一部数学著作《周髀算经》；春秋末年鲁国人商泽是孔子的弟子，为“七十二贤”之一；战国时期的商鞅，是为秦国奠定统一基础的功臣；明朝“科举超人”商辂，乡试、会试、殿试皆第一，分获解元、会元、状元三顶桂冠；中国宋代探花商衍鎏是著名学者、书法家；大家熟悉的商承祚先生是古文字学家、金石篆刻家、书法家。

师姓在偃师市高龙镇、大口镇都有聚居地。高龙镇师家寨有500多人姓师，该村东北有一坟地，内有明代墓碑，记载该支师姓乃由山西洪洞县迁此；大口镇韩村也有师姓，查其来源，乃明朝万历年间由师家寨迁此，现有700多人。

师姓行业特点明显，来源之一是以技艺为氏。据《元和姓纂》载，春秋战国时期，擅长乐技的人被称为师。晋国有师旷，鲁国有师乙，郑国有师理、师惠、师触、师躅，皆为著名乐师。其中晋国乐师旷双目失明，善于辨音，晋平公造编钟，惟师旷能听出音调不准。

说起师旷，还有一个故事：商末师常常为纣王作曲，乐声萎靡悦耳，纣王听而倦。武王伐纣，师常携琴投濮水而死。自此，水中常有靡靡之音传出，这就是“靡靡之音”的出处。后来，卫灵公到晋国参加庆典，朝辞帝丘，暮宿濮上，夜半听见有靡靡之音时隐时现，微妙悦耳，遂召随行乐师涓询问，师涓说：“此乃靡靡之音。”及到晋国，灵公赴宴，唤师涓曰：“过濮水所获妙曲，速援琴以助雅兴。”未等师涓弹奏完，晋国乐师旷制止道：“此为亡国之音，不可听！”这就是“亡国之音”的出处。

师旷的后人，自然也姓师。

陶姓一支出自唐尧，一支出自虞舜。《元和姓纂》记载，尧担任部落首领之前，以制作陶器为业，其子孙中有人姓陶；西周初年，舜之裔孙虞思官至陶正（管理制陶的官），其子虞阏承袭父职，其子孙以官为氏，姓陶。

陶姓名人较多。东晋名将陶侃是著名诗人陶渊明的祖上；陶渊明写有《桃花源记》，格调不俗；近代教育家陶行知最早关注乡村教育，其名言“捧着一颗心来，不带半根草去”，传递了一种无私奉献的精神。

我市陶姓颇多，此不赘述。

我市还有药姓，但没有医姓。据说医姓很容易为小孩取名字，而药姓取名就不那么容易了。有人开玩笑说，姓医的可以取名“医生”，而姓药的不能取名“药品”，其实也未必。药姓中就有取名“药生尘”者，立意非常好，化用了一副对联“但愿世间人无病，何妨架上药生尘”。药姓传为乐毅后裔。

铁姓起源有二：第一出自子姓，乃商朝王公之后，以地名为氏。春秋时卫国戚地有铁丘（今濮阳北），住在那里的商朝王公后人以铁为姓。第二是出自他族，回族、满族、蒙古族中的铁姓较多，主要分布在西北、东北地区。铁姓人口不多，没有进入中国姓氏前300位。《洛阳市志》第二卷第629页显示我市有铁姓。

西安事变后，最忙碌的是洛阳机场。  
事变第二天，这里便迎来了重要人物……

□记者 孙钦良

洛阳机场迎来的这一重要人物，是西安事变的重要斡旋人威廉·亨利·端纳。

端纳是澳大利亚人，记者出身，1903年到香港从事新闻业，从此与中国结缘，先后出任孙中山、张学良、蒋介石的文化顾问。一个外国人，为啥能担此重任——调停事变后南京与西安的关系？这得从头说起。

原来，日本人为鲸吞我东北，曾派一名医生设法接触手握重兵的张学良，使他染上鸦片瘾，妄图以此使他意志消沉，不能主政。端纳却请德国医生为张治愈了鸦片瘾，因此张对端纳很感激。

西安事变之初，南京方面来人，张学良一概不见，但他不能拒绝端纳。宋美龄脑子清醒，选择调停人时，首推端纳出马——端纳此时是蒋的私人顾问。

端纳在事变次日即飞抵洛阳，向祝绍周了解情况后，于12月14日从洛阳机场起身，身带宋美龄亲笔书信到西安，并按照主和派的意图开始与西安交涉。但是，他在西安无法与南京联系，便于15日又飞回洛阳，当晚用长途电话告诉宋美龄：西安事变有和平解决的可能。

宋美龄在洛阳的端纳打电话：“请你再飞西安。现在当务之急，是让委员长知道何应钦欲用军事手段进攻西安，这很危险，可能激怒张学良。你要把这一情况告诉委员长，让他写信制止何应钦！”

宋还告知端纳，她准备携宋子文或顾祝同，代表南京政府赴西安谈判，要端纳征求张、杨的意见，能否允许她去西安。16日，端纳带着宋的口信，再次由洛阳飞往西安，向张学良、杨虎城传达信息，并向蒋通报了南京方面的情况。

这段时间，洛阳机场已开始为老蒋出力，起降的所有飞机都是为了营救他。经过端纳从中调解，被杨虎城扣押在西安的蒋鼎文获得自由，被允许离开西安飞往洛阳。17日蒋鼎文飞抵洛阳后，住了一晚，并与南京的宋美龄取得联系，让宋美龄在南京稳住主战派，不让他们妄动。18日上午，蒋鼎文乘飞机由洛阳飞往南京，把蒋介石的亲笔信当面交给了何应钦。何应钦这才下令：部队勿向西安靠近，停止军事行动3天。

老蒋真的感谢洛阳机场，若没这个便利条件，何应钦的大炮一响，西安方面肯定恼怒，老蒋的性命就堪忧了。

为利用洛阳这个平台，就近处理西安事变事务，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派出了以中央委员赖琏为首的12人小组，携带电台抵达洛阳，在洛阳军分区建立了国民党中央党部临时办事处。

与此同时，轰炸机等也到了洛阳机场，洛阳百姓每天都听到飞机轰鸣。22日14时，宋美龄飞往洛阳，“机抵洛阳上空，俯视机场，轰炸机罗列待发，心坎突增阴影”。

她觉得问题很严重：中央军随时还会进攻西安！在洛阳只能停留1小时，必须马上飞西安！她利用这60分钟时间，紧急召开驻洛将领会议，告诫大家：“在同西安方面谈判期间，不准进攻西安，飞机也不得飞近西安！”

她赴洛阳机场时，含泪对大家说：“誓随委座不离，家事均已安排，随时准备牺牲！”然而，在她与众人话别之际，“解救小组”成员蒋鼎文悄然离开，躲进洛阳某寓所，不愿随她冒险去西安。

这也难怪，蒋鼎文刚被释放，好不容易离开西安这个“火药桶”，哪里还想回去？宋美龄大怒，找到蒋鼎文说：“谓我以女流尚冒险入陕，铭三（蒋鼎文字铭三）革命军人，岂畏死乎？！”

这样一拖延，就是半小时，直到下午3点半，飞机才重新起飞，宋美龄带上蒋鼎文赴西安。随后的谈判过程中自然有波折，经周恩来先生出面调停，才得以和平解决，蒋允诺抗战，离开西安，飞往洛阳。

张学良很讲义气，他要陪蒋来洛阳，一是表示诚意，二来也是为了蒋的安全和面子上好看。他置部下劝阻于不顾，执意赴洛，意思是：我之“兵谏”是为抗战，出于公心，并非出于个人恩怨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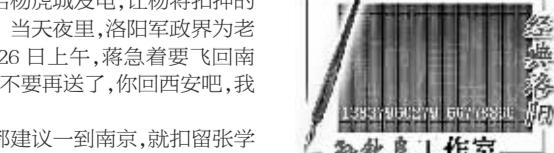
25日下午4时，飞机从西安机场起飞，一个半小时后到达洛阳。洛阳军政界早已组织各界代表，列队欢迎蒋脱险归来。立了大功的祝绍周看到蒋走出机舱门，领着军校官兵高呼：“蒋委员长万岁！”喊声刚落，看见张学良走了出来，他又带头高呼：“打倒张学良！”

蒋介石心里很高兴。一到洛阳上空，他便如释重负：总算安全了！听到祝绍周这样喊口号，他心里虽受用，口头上还是训道：“祝主任，你这是干什么，怎能这样对待张副司令？干脆喊打倒我算了。”他走下飞机，临上车还谦让一番，请张学良先上车。

汽车向国民党陆军学校洛阳分校驶去。

在洛阳稍作休息，蒋就让张学良给杨虎城发电，让杨将扣押的卫立煌、陈诚等军政大员释放回南京。当天夜里，洛阳军政界为老蒋压惊，自然是把张学良晾在一边。26日上午，蒋急着要飞回南京，张学良还要送他，蒋故意说：“汉卿不要再送了，你回西安吧，我担心南京方面会有人不谅解你啊！”

其实经过一夜密谈，蒋的幕僚们都建议一到南京，就扣留张学



## 西安事变后的洛阳

洛阳历代战役系列（四十九）

良。有人后来回忆：在简单的欢送仪式后，蒋介石偕宋美龄乘机起飞，随后张学良也乘机起飞了。在张的座机起飞前，先有两架深绿色的战斗机“保驾护航”，随后又有7架战斗机尾随飞行。看到这种情形，有人已意识到张学良此去凶多吉少。

果然，张学良一到南京便失去自由，被长期拘押起来。

如此看来，西安事变这一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虽发生在西安，但事变前后的重要活动都发生在洛阳。其中，为营救老蒋出了大力的祝绍周1938年任鄂陕甘边区警备总司令，1944年任陕西省政府主席，1949年去台湾，任台湾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委员，1976年死于台北。向祝绍周出卖张学良密电的黄永安1937年晋升陆军中将，后任第6军副军长，1949年去台湾，成为闲员，1979年死于台北。

